

我国近十年目录学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乔 好 勤

西方图书情报领域在六、七十年代完成了两项重要的革命：方法论和 MARC。

方法论的变革使图书馆学目录学研究中的历史方法、定性分析方法的比重相对下降，定量分析方法为人们所普遍接受，广泛地利用数学知识为文献变化规律、为目录工作和图书馆工作的各种现象与过程制作数学模型，系统论控制论方法的应用为目录学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形成了一些新的学科分支。

方法论的变革也为目录工作自动化研究提供了工具。1965年美国国会图书馆以艾芙拉姆夫人为首的“情报系统专家办公室”开始了“用机器记录国会图书馆的目录数据”的研究。1966年进行正式的 MARC 试验，1967年机读目录 MARC 宣告实验结束，1969年3月正式出售 MARC II 磁带版目录资料，完成了一项改变全球图书情报工作性质的划时代的革命。

然而，正是在这重要的十年，我们却关起门来闹“革命”——“内乱”，1974年，封闭的大门打开了一点，在周总理关怀下，作为文献工作自动化基础的汉字信息处理技术的研究748工程被列入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刘国钧先生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向我国图书情报界、目录学界翻译介绍了美国的 MARC 计划及其进展，在全国引起极大的震动，也为新时期的目录学研究揭示了序幕。

1979年彭斐章、谢灼华教授发表了《关于我国目录学研究的几个问题》一文，从目录学研究对象、目录学史、专科学目学、目录学方法等几个方面，总结了过去，提出今后研究的重点，对近十年的目录学研究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从1977年到1980年发表的

近两百篇目录学的文章来看^①，其论述的主题大多是“文革”前的延续，关于目录学的对象的讨论最为典型。其它诸如关于列宁与书目、鲁迅与书目、目录学与读书治学、目录学与其它学科的关系、互著和别裁、提要等等，大体上没有超出五——六十年代议论的主题范围。但是，这一时期目录学研究生的招生、目录学研究资料的搜集编印、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会下目录学组的建立、书目文献出版社的建立，为以后的目录学的发展准备了条件。1978年成立了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编辑组，同时民国时期总书目的编辑工作也着手进行。1980年3月召开了全国第一次联合目录工作代表会议，9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机器检索学术讨论会，1979年底成立全国文献工作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并下设书目著录分委会等等，说明我国书目编制和目录工作标准化自动化开始迈出了新的步伐。

1981年以后，除老一代目录学家继续进行目录学研究外，一批受过正规训练的目录学研究生相继毕业，一部分目录实践工作者和本科毕业生也开始涉足目录学研究。他们出于历史的责任感，用新的思维方法，积极投入目录学研究，发表了一批内容新颖、有开拓性的文章。不论从研究领域，还是从研究深度看，显然有了较快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1981—1984年发表论文至少有580多篇^②，显示了目录学研究由恢复阶段进入了迅速发展时期。

1982年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合编的《目录学概论》一书由中华书局出版。这是解放后我国正式出版的第一部目录学教科书。虽然它沿用了“论、史、法”的体系结构，但全面总结和吸收了解放后目录学研究的成果，

摆脱了以史概全的旧格局,被全国大部分图书情报系科选用为教材,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不久又出版了吕绍虞的《中国目录学史稿》和王重民的《中国目录学史论丛》等。这些著作有的是文革前的旧稿,有的是新编新著,反映了作者对目录学研究的浓厚兴趣及学术基础。

1983年在沈阳召开了全国目录学专题学术讨论会,从参加会议的64篇论文的内容来看,它集中反映了我国目录学研究主要课题和新的动向,对于促进新时期目录学的发展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1984年底,中国科学院图书情报系统以“二次文献工作的理论与实践”为中心议题召开了第四次科学讨论会,对信息时代的二次文献工作面临的问题和对策、二次文献工作的意义和前景的讨论,丰富了当代目录学的内容,给目录工作者以很大的鼓舞。

与此同时,情报界对建立我国文献检索刊物的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热烈的讨论,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

1985年和1986年,发表目录学论文228篇,1987年以来的两年未计。

经过前几年的努力和开拓,目录学研究的领域扩大了,一些认识上的分歧,逐渐明确并趋于一致,当然,随着目录学的深入发展,又会出现新的分歧。把图书馆系统的目录工作、情报单位的二次文献工作、出版发行和档案系统的目录工作,以及各科研部门的书目索引工作等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建立国家书目控制系统,把书目情报服务、目录工作标准化、自动化、书目工作组织管理纳入目录学研究范围,根据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建立新的目录学理论体系,将成为大家思考的重要课题。

1986年正式出版的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教材《目录学》一书,总结吸收了近年来的研究成果,是根据目录学的发展和时代的需要,对适应信息社会的目录学体系的有益探

索。

为了互通信息,交流经验、集中讨论大家共同关心的课题,1986年初,一些中青年目录学研究者自发组成“目录学研究通讯小组”,采用“笔会”形式开展学术活动,为目录学研究增添了新的活力。

这一时期正式出版了《目录学论文选》和《目录学资料汇编》,其意义不仅在于给目录学界提供了一部复制的论文资料,而在于以正式出版物的方式,对建国以来目录学研究予以总结,肯定了目录学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取得的研究成果。

在专题和专科目录学研究方面近年来取得了较大的进展,积累了丰富的资料,此时陆续结集成书。同时作为专科目录学的延续和扩展的有关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文献检索系列教材也相继问世,在种类繁多的史学史、工具书研究著作中,也都有目录学的内容,反映了目录学研究的不断开拓和不断深化。苏联《目录学普通教程》和美国《索引的概念和方法》的翻译出版,以及许多国外目录学论文的翻译发表,反映了中外目录学交流的加强。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陈国庆《汉书艺文志汇释》、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叶瑛《校讎通义注》、王重民的《校讎通义通解》及其它一些古典书目著作的注释出版或再版,为目录学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历史材料。

新时期十年的目录学研究,是在窒息沉睡十年之后,背负着历史的重袱,接受时代的重托,迎接新技术革命的挑战的。这是一个复杂的历史时刻。客观条件和现实环境使目录学研究在困搅、迷惘、冲突和碰撞中探索前进。但目录学毕竟经受住了一次严峻的考验。它从困搅和迷惘中走出来,在继承中华两千年优秀目录学遗产的基础上,大胆吸收国外目录学先进思想和方法技术,消化、融合、改造以丰富自己的研究内容,逐步建立新的目录学理论体系,并努力和目录工作

实践结合起来,为建立我国书目情报体系和实现国家书目控制提供思想指导和理论基础。十年里,能发表这么多的论文,出版这么多专著,组织这么多活动,这在中国目录学史上是不多见的。

十年目录学研究成绩巨大,进步明显,无可否认。但是,十年目录学研究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其中有冲突,有困惑;又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与其它许多学科相比,仍然步履散漫,跟不上时代的需要。

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由于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迅速发展和各相关课程的开设,学科和课程之间出现了大量交叉;编目方法让给了图书馆目录,目录编排法让给了分类、主题和检索语言,目录索引的查找利用让给了工具书,科技书目索引的检索有了科技文献检索课,版本与古籍目录有了图书馆古籍编目课,目录工作现代技术由图书情报现代技术去研究,连刚刚出现的计量书目学、书目控制论,现在也由情报学抢先,建立了文献计量学、情报控制论,这样,传统目录学留给自己的研究领域、除了理论,就是目录学史。

难怪一种危机感时时困扰着目录学研究者。有人强调目录学的特点,高擎独立的旗帜;有人竭力论述目录学与相关学科的不同,以示区别;有人惊呼有被诸强鲸吞的危险。不管其表现形式怎样,都是这种危机感的表现。

目录学陷入这种困境的原因,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其中受传统目录学思想的束缚太重,应变能力太差,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它表现在五个方面:理论体系;方法论;传统观念;知识结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其一,关于目录学理论体系问题。

目录学知识被许多学科所利用,所攫取,而留给自己的日见贫乏。这件事本身就说

明了旧的目录学体系被动摇。

从三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不管目录学研究取得何种重要的成果,但一种严密的逻辑结构体系并没有确立起来。以余嘉锡为代表的传统目录学派,基本上是章学诚目录学思想的阐述和完善;以杜定友为代表的新目录学派,彻底否定传统目录学,而所建立的也只是目录学的某一部分——图书馆编目学。姚名达则囊括古今,兼融中外,《目录学》一书首创“论、史、法”结构,但他的主要贡献在于目录学史方面,理论方面的思考显得相当薄弱,而过于短暂的生命,影响了他对目录学理论方面的建树。

解放后,王重民、吕绍虞及当时的许多青年目录学研究者,开始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来探讨目录学研究问题。讨论是认真的,方向是正确的,但很可惜,提出的问题尚未得到解决,对已形成的认识尚未来得及总结,就被突如其来的“十年动乱”卡住了,留给我们今天的仍然是姚名达的“论、史、法”模式。

“论、史、法”结构自有其长处,在四、五十年代也有过一些影响,但它算得上一种理论体系吗?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应该是建立在一种方法论基础之上的许多理论、概念彼此密切相连的有机整体、以此来绳“论史、法”,它只能算作目录学的块状结构,分别代表目录学的三个组成部分,称之为体系是不恰当的。即使把“论、史、法”看作一个知识框架,在迅速发展、支流繁多的当代目录学面前也日渐捉襟见肘。当代目录学的许多重要研究内容,如书目控制、计量目录学、书目情报、目录工作组织管理、目录工作标准化、自动化等就是“论、史、法”结构框架所无法包括的。

理论是实践的概括总结,“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②既然传统的手工的书本式的目录工作在逐渐地被现代化自动化目录工作所取代,既然目录工作的社会组织形态由个

体的分散的体制逐步过渡到国家和国际书目控制,旧的目录学理论赖以存在的社会实践已经发生变化,用新的目录理论体系代替旧的理论体系自是必然的了。近几年人们热衷于目录学体系的研究和讨论,就是这种变革的反映。有人干脆认为,它应该是以“书目情报”为起点,根据“知识—文件”的逻辑顺序,由应用原理、发展原理、理论原理三个层次构成的一个原理体系。

用新的目录学体系代替旧的目录学体系这是必然的,但它必须在认真剖析了两千多年目录工作发展的历史、总结了当代全部目录工作实践、对目录工作的未来有了一定的认识之后,才能建立起来。体系是客观实践和时代的产物,需要几代人共同的努力。因此,“一个新的目录学体系正在形成”的提法比较切合实际。

其二,关于方法论问题。

科学理论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科学研究的方法。“如果在解决问题的关键时刻,不去研究思维过程本身,也就是说导入新的思维方法,是不能顺利进行的。”^[1]在过去的目录学教材和论文中很少谈到方法论的问题。1982年我在《现代科学技术与目录学的发展》中强调“吸收其它学科领域里的知识,移植科学史上出现的各种方法,根据本学科的特点,形成自己的方法论体系。”同年出版的《目录学概论》也谈到“关于目录学数学化的趋势”和“关于目录学的研究方法”问题。几年来发表了不少专门研究某一方法在目录学中的应用的文章,主要侧重于控制论、系统方法、数学方法等。这些论文有的介绍了有关这方面研究的进展,有的阐述了某一方法引进目录学的意义,有的探讨了向目录学渗透的机制,还有人专门讨论了目录学史的研究方法。我们可喜地看到,不少论文和专著已经自觉地应用统计、调查、系统论、信息论的方法,使得研究的水

平有了较大的提高。但是,对于目录学方法论的整体研究、对建立目录学方法论体系的探讨还显得十分不足。

由于各科新的方法的导入,目录学研究领域产生了一些新的分支。数学和统计方法的应用,形成了计量目录学,使文献和书目信息的分析计量化,在书目情报服务和书目工作自动化方面发挥了作用。有人强调要“逐步确立计量目录学的体系和基础理论”。甚至认为“当代目录学是计量目录学的时代。”控制论方法的应用,形成了书目控制论,为各国及世界范围的书目工作一体化提供了理论基础,有人认为“目录学是研究对所有图书文献资料实行目录控制的理论和方法。”不应该把“书目控制作为现代目录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而应“作为现代目录学的主体”。系统方法已经广泛地应用于目录工作组织管理、目录工作自动化的研究和建设,有人提出“目录系统工程”的概念。

近几年在其它学科领域,一些年青人抓住一种新思想新方法,就建立一个什么“学”的现象,已引起人们的警觉。而在目录学领域,似乎要稳妥得多,甚至有点过于老成持重。有的人思想还没有从传统的束缚中完全解脱出来,对新的知识持冷漠观望的态度。我们希望能有更多的同志投入这些新课题的研究,对这些新课题的研究下点苦功夫,广泛深入地调查研究,持之以恒地积累资料,站在新的高度进行概括分析,使我们的研究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其三,关于观念和知识结构问题。

观念:人们的思想、意识、观点,也即“过去印象在意识中的再现”。传统观念是在人们头脑中长期积累下来的较为稳定的心理积淀。当事物已经发生了变化时,有的传统观念往往落后于事物发展的需要,束缚了人们的思想。

由于我国目录学历史悠久,许多目录学

理论和方法发挥过重要作用,影响深远;近现代目录学家对古代目录学又缺乏深刻的批判,继承多于创新,所以传统目录学思想在人们头脑中还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影响目录工作和目录学研究在新的形势下开拓前进。

管见所及从下述几个方面逐步改变旧的传统看法,更新观察和思考问题的方法很有必要。

1. 目录工作已由孤立的个人活动,变为国家的人类的事业;在一个国家里,所有的目录工作应该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因为整体大于各部分之和。

古代的目录工作,大多是学者、目录学家、藏书家个人的事。宫廷的书目工作,虽有国家拨款、大臣主持,也不过是为了一部书目,既无常设机构,也无明确的固定的方针政策。十九世纪以来,联合编目、集中编目工作迅速发展,反映了目录工作由小范围向大范围发展的历史必然性。

当前,在整个人类社会中,目录工作仍然是一个很小的领域,但它已伸向了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可以说无处不在。小至每个人的学习和工作,大至整个国家经济、政治、科学活动,都离不开目录工作的参与。每一个图书情报机构、每一个科研单位都在开展书目索引编制和书目情报服务活动。全国全世界每天都有数万计的目录工作者采用各种手段和各种方法记录、存储、揭示、报导百万计的文献。这是一架庞大的活动的机器。今天,我们在考察和研究目录工作时,应从全国和世界这个大角度出发,研究书目情报的交流,建立全国目录工作体系,实现标准化自动化,把加强目录工作组织管理的研究放在重要的位置。

2. 随着目录工作由个人活动向大系统的转变,目录工作的目的和性质也日渐发生变化。除一部分书目工作仍保持其学术性、教育性外,从整个文献目录信息报导体系来

看,主要是为了及时、准确、有效地向科学研究者提供书目情报。也就是说,今天目录工作的情报性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显得更为突出和鲜明。传统目录学中那种以考据见长的方法;对每一部书都认真阅读,细心考证,品评得失的做法,只能适用于个别书目,而对绝大部分目录工作来说,它需要的是有组织的、企业化的、集体劳动,是采用更为先进的现代化技术,以较快的速度传递文献的目录数据,尽可能地促进文献资料的共享。

3. 由于上述变化,目录工作者大多也不应该是钻进书堆,矻矻穷年,皓首成一书目的学究,而应该是熟练地掌握书目著录、文摘编纂标准、手工的和机器的实际操作程序的“技术员”,是能从事目录工作决策、施政,协调机构与机构、人与人之间关系,对目录工作进行有效组织管理的“企业家”。同时,目录工作者除了要考虑目录在经济建设和科学研究中如何发挥更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外,随着书目情报工作的企业化,还要考虑如何不断提高书目情报服务质量,降低编制成本,得到更多的经济回收问题,因而,目录工作者也应该具有过去人们所不屑一顾的“经济人”的头脑。只有这些观念上的变化,才能适应变化了的目录工作的时代需要,才能保证目录工作的质量、效率以及在竞争中生存下去的必要条件。

4. 关于目录学研究和研究者知识结构的看法也应该有所改变。

过去,我们的目录学研究偏重于目录学家及其著作的评论,书目方法的归纳和目录学理论的探讨也大多是定性分析和逻辑演绎,是以文字考证、经验总结和理性思考为主的。随着现代目录工作的发展,除了目录学史研究外,不宜再以埋头于资料的排比考证为能事,而应像技术科学那样进行反复的试验、设计,像社会学那样进行大范围的调查、统计,在掌握大量数据的基础上进行计量分析,从大量现实的生动的实例中总结出

理论、方法和措施来。

目录学研究不再囿于文史的圈子。虽然目录学仍然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但已引进了大量社会学、经济学、数学和技术科学的知识。传统的文史型人才已不能完全适应今天目录学研究的需要,他应该是文史理工兼备的“多学科专家”。

清人周长发、章学诚曾把目录、版本、图书发行学家称为“横通”,^⑤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杂家”。这种看法仍然是正确的。不过,他们所说的“横通”,是通于古书的经、史、子、集,大体不出传统的文史的圈子。今天我们应该赋予“横通”以新的内容,目录学家应该成为现代科学文化的“杂家”。

与十年前相比,目录学研究者的知识结构确实已经有了很大变化。老一代学者有的已经扫过“机盲”,近几年毕业的研究生、本科生大多选修了数学、计算机和管理学课程。但是,应该看到这些变化离实际需要还相差甚远。从事目录学学习和研究的研究生本科生都是从文科招进来的学生,传统观念使他们特别重视文史知识的积累,而对数理和现代技术的课程兴趣不大。为了克服这一弊病,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将来目录学研究生可以试行文理兼收的办法,从根本上解决人才知识结构问题。

其四,关于目录学研究和目录工作实践的结合问题。

关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早为许多经典作家所论定,其普及的程度几乎是无人不知,但是实际上,理论脱离实际的现象是仍然存在的。

理论研究应是反映实践,指导现实的实践活动,并力争尽快产生社会效益。但是我国的图书情报学目录学研究成果很难与实践结合并付诸实施。前几年有人呼吁“谁来当红娘?”不从体制上解决问题,各人只管走自己的路,呼吁岂能解决实际问题。

目前我国图书情报界目录学界出现的“超前研究”现象,就是理论脱离实际的一种表现。“思想走在行动之前,就象闪电走在雷鸣之前一样。”^⑥图书馆学目录学的发展战略研究、未来研究都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如果在我们连图书馆目录体系尚不健全、标准著录格式尚难以推广,经济上的困窘使图书馆大大削减书刊定购量、私人买一本书就要考虑是否影响生活的情况下,大谈“无纸社会”,取消卡片目录、实现家庭终端等等,无异于望梅止渴,望洋兴叹。这种超前研究只会转移人们的视线,放松改造客观现实的艰苦细致的工作。这种超前研究又往往引导人们走向脱离实际的遐想,发展到极端,无异形成自我否定。更使人惊异并值得深思的是,我国图书情报事业、目录工作本来远远落后于美英等国,而我国在图书情报理论思辨方面,却有超英美之势。难怪一些外籍华人无不为“中国青年图书馆学家”喜作哲学上的思考而啧啧称奇。据悉美国的许多图书馆学院仍然挂着原来的校牌,或将图书馆学情报学并列,而我国两年却曾为取消图书馆学、撤换头牌喧闹一时。超前研究所带来的后果,可见一斑。

除了超前研究中冒出的这种或那种“新学科”外,还有许多传统的研究分支要宣告“独立”,与目录学有关的就有版本学、索引学、文摘学、提要学……。是的,学科是在不断的分化,某一特定事物、某一知识领域的深入研究,都有发展成学的可能。但是,科学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纷繁万端的科学知识是有层次有联系的。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知识树”。它的许多枝叉看起来是独立的,但是它毕竟是某一主干上的枝叉,游离于科学主干之外的学科是不存在的。实际上,索引、文摘和目录都是检索文献的工具,从本质上看,三者的基本结构和功能大体上是相同的。在目录编制和书目情报服务各单位的实际工作中,把三者分割开来的情

况不多。特别是在电子计算机应用于目录工作以后,三者 在编制和检索方面的原理、方法与技 术没有根本的区别。如果索引、文摘、提要,版本研究都各自成学,它们也只是目录学领域的分支学科;把它们从目录学中分离出来,同图书馆学、情报学、目录学、档案学、出版发行管理学并列,成为图书情报领域里的第六、第七、第八科学,并不符合实际,不必要也不利于工作。

当前,学科的分化是一个趋势,学科的交叉渗透也是一个趋势。我们不应该只强调一方面而忽视另一面。实际上,图书情报领域里的几个学科交叉渗透的地方很多,在工作实践中也往往纠合在一起,可以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目录学更是这样。它是 以知识为定域基础的学科,而不是以部门为基础的学科。它渗透到各个领域,为各个部门所利用。它与各知识领域相结合,也被各个部门所研究。所以目录学应该积极地汲纳图书馆学、情报学中某些先进的理论和方法,特别是其中关于目录学的研究成果,与图书情报界的研究者结合,去探讨大家共同关心的课题,诸如目录工作标准化、自动化、检索语言、书目控制等等,没有必要固守疆域。

目录学应该研究现实问题,应用和发展研究自当是其重点。近十年我国在这方面取得的成绩很大。其一是《全国古籍善本书目》、《民国时期总书目》等的编纂及其有关问题的研究;其二是我国检索刊物体系的建设及其研究;其三是联合目录工作的恢复发展及有关的研究;其四是目录和索引刊物著录标准化及其研究;其五是编目和检索自动化的研究和实施;其六是各专科、专门

目录工作和目录学的研究、各门文献检索课程的设置。

下一步,我们应该从总体上全面考察各部门、各类型的目录工作,根据我国国情,研究整个目录工作发展的战略和策略,建立全国目录工作体系,形成全国书目情报系统,为实现国家书目控制而努力。

这是一个奋斗的目标,也是一个协调全国目录工作的机制。在这一总的规划之下,既能充分发挥图书、情报、出版发行、档案和各科研部门的目录工作的作用,又能最大限度的杜绝重复和浪费。使全国目录工作成为一个配置适当,彼此协调,顺利运行的有机体系。

为了完成上述任务,目录学研究要加强横向联系。各图书情报系统、各有关部门之间,以及各目录学教学和研究单位之间,携起手来,组成专题研究小组,集中力量探讨解决一些个人或部门无法解决的重大课题。在这方面,我们希望能得到国家科委、国家教委、文化部、新闻出版总署、国家档案局以及图书情报部协调组织的支持。

附注:

① 据南京图书馆编《图书馆学论文索引》(1949—1980)“目录学类”统计。但除本类外,其它部分也有目录学的论文,因此这个数字是不完全的。以下几个统计数字同此。

② 南京图书馆《图书馆学论文索引》(1981—1982)“目录学类”收录论文190多篇;徐立纲《目录学论文选录》(1983—1984)收录论文388篇。

③ 《列宁选集》第3卷 第398页。

④ 爱因斯坦语转引自《科学研究的艺术》科学出版社 1979年。

⑤ 章学诚《文史通义》中华书局 1985年版。

⑥ 海涅语 转引自《文化的冲突与抉择》人民出版社1987年。